

土 社 會 研 究 叢 書 之 二

當代中國農村研究（上）

理 論 探 索

阮新邦
羅沛霖 主編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本土社會研究叢書之二

阮新邦主編

當代中國農村研究(上)

理論探索

阮新邦 羅沛霖 主編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當代中國農村研究 (上) 理論探索

主 編 阮新邦 羅沛霖

出 版 者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1060 Main Street, River Edge,

NJ 07661, USA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初 版 2000年11月

國際書號 ISBN 1-879771-47-0 (pbk)

版權所有 ©2000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叢書主編：

阮新邦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編審委員：

蘇國勛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

謝立中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翟學偉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

林 端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陳介玄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曾乃明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本土社會研究叢書序

早在三、四十年代便有社會科學中國化的推廣，但其時的本土化研究，主要是建立一些適合國情的“實質”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社會狀況，較少觸及根本性的問題。這時期的討論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也由於種種客觀的社會和政治因素使然，討論很快便中止了。直至八十年代初期，這一個課題在華人社會科學界再次引起討論。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尤其是心理學界，這些年來在理論和概念層次上，以及實徵社會研究裏，做了不少顯著的工作。然而，另一方面，無論是早期中國大陸的學者或現在港台的社會科學家，他(她)們在這方面的探討多集中在理論和概念上的建構，以及把這些建構應用在實徵的社會調查上。這當然是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重點工作，但有一點是這些學者所忽略的，是自六十年代末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界對社會科學本質所作的反思。西方學術界在這問題上的探討既深且廣，使得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愈來愈多社會科學家發現社會研究的局限性，他(她)們對“科學”、“真”、“客觀”和“驗證”等概念有重新的認識和理解。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再不是原先想像般把社會事實不變地描繪出來。以往

要建立的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性”，也不能像自然科學般，其解釋力是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而可能只是用來解釋某個社會的特定時間內的現象。

這是問題的關鍵。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推廣運動，是源於不能純依靠建基在西方文化脈絡之上的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社會現象。然而，如何才可以較精確解釋社會現象卻是近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因此，這也是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重要課題。當然，這並不是說先要解決此課題才可以從事理論及實徵層面的本土化研究。反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問題是沒有最後的一致答案。但要指出的是，對這些問題的一定理解可以促使研究者更能明白社會研究的本質及局限，以及明瞭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各種不同層次的建構。這樣會減低對本土化研究的過高期望或迷惘，同時亦有助於建立本土取向的理論架去從事實徵社會研究。

本系列叢書是順應着這一背景脈絡而產生。其主旨是要推廣本土化社會研究，建立適合華人社會的本土理論和概念，並由此結合西方的社會理論來解釋華人的社會現象和行爲。本叢書的範圍包括哲學和後設理論層面的本土化探索、本土理論的建構、以及建基於本土角度的實徵社會調查。本叢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國內簡體字版，八方文化企業公司出版海外繁體字版。

阮新邦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五日

序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後，中國政府於一九七九年開始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首先受影響的是農村地區，其經濟體制出現了結構性的根本改變，這特別顯現於南方沿海的農村，這地區的經濟建設的發展尤其迅速。另一方面，隨着經濟不斷發展，政治環境也慢慢地寬鬆起來。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由於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傳統宗族活動，也在八十年代開始復蘇。然而，經濟的活躍發展同時也帶來社會結構上的變化。這裏出現一些頗為吊詭的現象。一方面是宗族活動的復蘇似乎重新強化了傳統上尊下卑的人際關係，但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所衍生的功利主義和自主意識趨向的價值觀，卻似乎衝擊着傳統的人際關係。這是否會削弱了伴隨着宗族活動復蘇的傳統家族文化對人的影響力呢？為了探討經濟現代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影響，我們從一九九四年起，在珠江三角洲的一條農村進行田野考察式的研究，目的是要檢視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下的現代化發展與傳統家族文化之間的張力。經過四年多的努力，我們於一九九八年完成了《婚姻、性別與性：一個當

代中國農村的考察》一書，¹發表了我們研究的初步結果。該書主要闡述中國南部農村有關婚姻觀念、兩性關係、及對性等觀念的變遷。

於一九九六年初，在撰寫上述研究報告期間，我們把研究範圍擴展至北方的農村，希望透過比較南北農村的特徵及變化過程，擴闊和加深理解經濟現代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影響。我們的研究發現，南北農村無論在經濟發展的程度，或者是家族結構的表徵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就我們所研究的北方田野地點而言，其經濟建設大為落後於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村。我們的研究仍然在進行中，其中的一個重點是放在兩地農村的差異及變遷的比較上。我們認為現在是適當的時候發表我們研究的部分結果。但在現階段，我們仍未把南北田野資料作較詳細的比較，我們的研究報告是以獨立的文章形式出現。在理論和實徵層面上揭示中國農村研究的一些重要特徵。我們把這些文章編成上下兩冊書。上篇專注理論探索，下篇則屬於實徵調查的範圍。

上篇的理論探索主要環繞着三個課題開展。首先涉及的是社會研究的本質。不少人認為社會科學的“科學”地位主要在於其研究結果可以用經驗資料去證成其真假值或正確性。換言之，社會研究的“科學”特徵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經驗社會調查(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的可能性上。太多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實證論者心目中的自然科學研究模式作經驗社會調查的典範。他(她)們應用“驗證程序”(verification

procedure)、“普遍性”(generalization)、“可重複性”(replicability)等概念來評估社會研究的結果。然而正好在這裏，我們看到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近年來的發展的問題所在。究竟根據或仿倣自然科學的模式來從事社會研究會帶來何種成果呢？很多曾接觸社會學這學科的人認為，社會學是一門沉悶而缺乏深度的科目。他(她)們譏諷社會調查的結果通常只是反映了一些“普通常識”層次的事實，造成這情況的主因是不少社會學者亦步亦趨跟隨着實證自然科學觀的研究程序和目標。不但一般廣為應用的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是根據此一模式而設計和運作，以至在定性調查法(qualitative method)裏的深入訪談(indepth interview)，甚而是介入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等研究方法，也盡可能符合此一實證研究模式。一般從事經驗研究的學者都會認同社會調查除了要找出現象的因果關係外，很多時要對相關的現象作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即是把社會現象的特徵扣連着相關的文化脈絡及價值系統呈現出來。但從實證社會科學觀的立場出發，任何描繪或解釋必須面對嚴格驗證程序上的真假值問題，因此，深度描述最後還是要化約成可被驗證的因果解釋模式。我們認為，這樣的研究進路不單只影響了調查方法的正確性，也扭曲了對社會研究的本質的理解。本書的第一章“社會研究的本質”對以上的問題作較深入的剖析，指出實證社會研究的困境，並由此引介有別於主流社會研究的批判詮釋論(critical-hermeneutics)，試圖顯示出具有價值介入的社會研究的可能性。

本書第二個課題是有關農村研究的理論建構的問題。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政策推行後，重修祖祠、重編族譜、修建祖墳、春秋二祭等活動在各地農村，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村地區展開。過往被壓抑下來的傳統宗族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復蘇起來。三十年來的巨大政治變革似乎未能動搖傳統家族文化對人的影響力。要了解中國農村社會，沒有人會否認家族文化是主要的切入點。家族文化裏的父權觀念，配合着五倫關係裏的親疏有別以及長幼有序的倫理規範，構成了中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並且影響着資源和利益的分配程序。但是改革開放後，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影響下，強調親疏有別的傳統交易模式慢慢被以市場價值主導的交易方式所取代，再加上強調功利意識、財富的追求、以及縱情色慾等現象瀰漫着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農村社會，維繫社會關係、以及起着“終極關懷”的作用的傳統家族文化似乎遇上比以前更大的挑戰。本書第二章“當代中國農村研究的理論探索”糅合了中國傳統家族文化、西方婦解運動的觀念、及自主性發展的理念作為理論架構，去分析中國南部農村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傳統與現代的張力。第三章“人際關係與自我觀的建構：理論架構”透過討論“父子軸”、“差序格局”、“自我的一致性”等觀念，去考察北方農村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變化。

研究當代中國農村的人際關係網絡，及其價值系統，必然會牽涉家族結構、世系組織模式等問題。第四章“多維視野中的宗族文化：回顧與綜述”嘗試對家族結構及其變化進行人類

學角度的探索，剖析西方及華人人類學學者，對中國農村家族結構及家族文化復活等現象的理論的爭辯，並希望由此顯示農村社會的文化深層結構。第五章“工業化與宗族文化：兩種人類學理論的分析”則試圖透過分析人類學裏的功能學派及結構主義的分別，並初步引進本土理念，解釋中國農村家族結構及其變化。

引進本土理念研究中國農村社會，主要是由於西方人類學理論未能確切反映中國農村社會的深層結構。自五十年代開始，西方的人類學學者從功能論(functionalism)的角度，解釋中國農村的家族結構及世系組織模式後，功能論成為了分析中國農村社會的主流理論框架。直至八十年代，一批華人人類學學者，透過根據他(她)們搜集的豐富田野資料，指出西方功能論由於缺乏本土角度，並不能確切地了解中國農村家庭的深層文化特徵。事實上，西方理論是否適用於研究中國社會的問題，並不單單發生於人類學的領域裏，心理學及社會學等學科也遇到同樣問題。本書的第三個課題是環繞着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而開展。

本書的第六章“從美國學者的中國農村研究看西方我族中心主義”及第七章“中國農村研究再探：跨文化研究的可行性”是要指出，研究中國農村社會的美國學者在其研究過程中作出對自己的角度進行反思的重要性。在七十年代，縱然美國學者發現了他(她)們的研究結果出現問題，他(她)們的反思大多只是停留在研究方法的技術層面，並沒有進一步從較深的文化

層次去檢視自己的角度。直至八十年代，才開始有美國學者反思其“西方我族中心的態度”，並由此對中國農村社會有較深層的同情理解。本書的最後一章，第八章“社會研究的本土角度”，以自我觀及行為的規範基礎作為切入點，檢視西方社會科學背後個人觀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預設，然後順應着第一章所闡述的批判詮釋論的立場，考察中國人自我觀的特徵及其在現代化歷程中的轉變，並以此為基礎指出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要深入探討中國人行為的規範基礎。

最後，我們要多謝香港理工大學對本篇各項研究的資助，同時也感謝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主任麥萍施教授這些年來對我們研究所給予的支持和鼓勵。

阮新邦 羅沛霖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釋：

- 1 阮新邦、羅沛霖、賀玉英，《婚姻、性別與性：一個中國當代農村的考察》（新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8）。

當代中國農村研究(上)：理論探索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後，中國政府於一九七九年開始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首先受影響的是農村地區。我們對中國南北方的農村進行了田野考察式的研究，希望透過比較南北農村的特徵及變化過程，擴闊和加深理解經濟現代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影響。我們的研究報告是以獨立的文章形式出現，在理論和實徵層面上揭示中國農村研究的一些重要特徵。這些文章匯編成上下兩冊書。上篇專注理論探索，下篇則屬於實徵調查的範圍。

上篇的理論探索主要環繞着三個課題開展。首先涉及的是社會研究的本質，其次探討的是有關農村研究的理論建構的問題，第三個課題是環繞着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而開展。



目 錄

本土社會研究叢書序

序

- | | | |
|---|----------------------------|-----|
| 一 | 社會研究的本質
阮新邦 | 1 |
| 二 | 當代中國農村研究的理論探索
阮新邦 | 45 |
| 三 | 人際關係與自我觀的建構：理論架構
李晶 | 79 |
| 四 | 多維視野中的宗族文化：回顧與綜述
李秀國 | 109 |
| 五 | 工業化與宗族文化：兩種人類學理論的分析
李秀國 | 155 |

六	從美國學者的中國農村研究看 西方我族中心主義 朱偉志	191
七	中國農村研究再探：跨文化研究的可行性 朱偉志	233
八	社會研究的本土角度 阮新邦	269
	編者及作者簡介	294



社會研究的本質

阮新邦

社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正確理解社會現象，而理解的正確性又牽涉理解的客觀性。一般來說，理解的正確性或客觀性是以自然科學研究裏的理解模式作準則。從傳統或實證的(positivistic)知識觀來衡量，正確的理解是不牽涉理解者的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但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研究者大多會認為，價值中立的(value-neutral)社會研究是很難達致的。

這是問題的關鍵，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處理這一個問題。從實際的存在層次看，研究者要理解人的行為或社會現象的時候，是很難不介入自己的價值觀，但主流的社會研究者會稱之為是心理層次上的價值介入。那是說，社會研究裏的價值介入雖然在現實的層次上可能是無可避免，但在客觀的驗證過程裏，是可以把相關的價值判斷過濾掉。換言之，在理論上或從邏輯的角度着眼，研究者可以把其價值觀抽離於其研究中。這裏顯示出事實陳述(factual statement)和價值判斷只有心理(psychological)而非邏輯上的(logical)關係。然而，另一方面，倘若從非實證的角度視察，事實陳述和價值判斷的關係是呈現出一種內在的或邏輯上的必然關係，無論在

心理上或邏輯上，對社會或人文現象的理解都必然會涉及理解者的價值判斷。這裏立刻引出一個提問，如果價值介入在邏輯上是無可避免的，那麼，是否可能建立對人或社會現象的客觀了解呢？換言之，我們能否建立有價值介入的客觀社會研究呢？

對此問題的不同看法，引發出不同的社會研究學派。在本書的第一章裏，我們從事實陳述與價值判斷之間的關係來討論社會研究的本質。這裏是要顯示出，對社會研究裏有關價值介入的問題的了解，會深深影響着研究者對社會研究本質的了解，而這又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着他(她)的社會研究的態度，以及在社會調查裏的資料搜集、鋪陳和分析的方式。本章的討論是環繞着這些問題而展開。在第一節裏，我們以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裏的“實然”(is)和“應然”(ought)的關係作討論的起點，檢視實然的事實層面能否推衍出屬於應然的價值層面的結論，嘗試從邏輯的角度視察事實陳述和價值判斷的關係。第二節由概念分析轉移至社會理論的層面，這裏跟隨德國社會理論的傳統，以韋伯(Max Weber)的“價值相關性”來考察價值判斷在社會研究裏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韋伯的“價值相關性”理論跟後設倫理學的一些主要學派持有相類似的觀點，他(她)們都認為價值判斷到最後只是個人的主觀抉擇，不能夠客觀驗證。這一個觀點清晰地體現於二十世紀中葉的實證主義或實證社會研究裏。第三節根據上述的討論脈絡顯示主流實證社會研究的困境。第四及第五節引介一個與主流社會研究截然不同的價值介入觀：強烈價值介入論(the strong thesis of value involvement)，指出事實陳述和價值判斷其實是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並由此檢視批判詮釋社會研究的可能性。